编者按：学习时报—百度中小企业景气指数（STBEI）每季度发布一次。该指数依托百度海量搜索数据刻画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运行的景气状态，有效反映我国中小企业运行状况，弥补我国在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监测方面的不足，提高经济监测的全面性和及时性。本指数所统计企业样本量为50万左右，包括31个行业和27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及中国台湾）的数据。景气指数范围在0-200点之间，以100为临界值。

学习时报—百度中小企业景气指数2015年一季度报告

报告主要结论

全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破位下行

工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由升转降

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跌入低位

东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跌至12个月来新低

全国省级行政区集体进入不景气区间（非增长状态）

全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破位下行

2015年1季度，全国中小企业景气平均值为100.2，处于景气临界值（以下简称“临界值”）以上的低位水平。景气走势逐月下行，从过去12个月内的最高点一路跌至最低点，并首次跌破临界值，进入不景气区间。本季度景气态势表明，随着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深层次调整期，中小企业受到的消极影响日益增大，经济运行状态低迷。从数据趋势看，这一颓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据此推断，2季度景气指数的走势难以乐观。（见图1）

工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由升转降

2015年1季度，工业中小企业景气平均值为101.1，稍高于临界值。季度内走势由升转降，1—2月份景气值从103.1微升至104.0，增幅为0.9，3月份景气值下降至96.3，跌至临界值以下，降幅达到7.7。（见图2）

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转入低位

2015年1季度，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平均值为99.7，处于微不景气区间。景气走势表现为1—2月份在临界值以上缓慢攀升，3月份下跌至临界值以下，数值为96.7。总体来看，从2014年2季度至今，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基本保持低位徘徊态势。（见图3）

东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跌至12个月来新低

2015年1季度，中部地区景气平均值略好于东西部，数值分别为东部98.8、中部100.4、西部98.5。今年伊始，东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景气度呈持续下滑态势，3月份已跌至12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见图4）

从景气程度看，东中部大部分省份景气平均值在临界值附近，东部的浙江省和中部的河南省表现最好，景气值都为103.8；西部地区各省表现欠佳，除贵州省为102.1外，其他各省均未突破临界值。从景气走势看，自1月份以来所有省份景气指数均持续下滑，并在3月份集体跌入不景气区间。与2月份相比，3月份东部的海南省降幅最小，降幅为0.4，西部的内蒙古降幅最大，降幅为5.9。

全国省级行政区集体进入不景气区间（非增长状态）

分析3月份各省份中小企业的景气状态（景气指数）和增长潜力（环比增幅）后发现，3月份，所有省份都进入不景气区间（非增长状态），这与年初全国大部分省份处于景气区间（增长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下滑态势明显，需密切关注未来景气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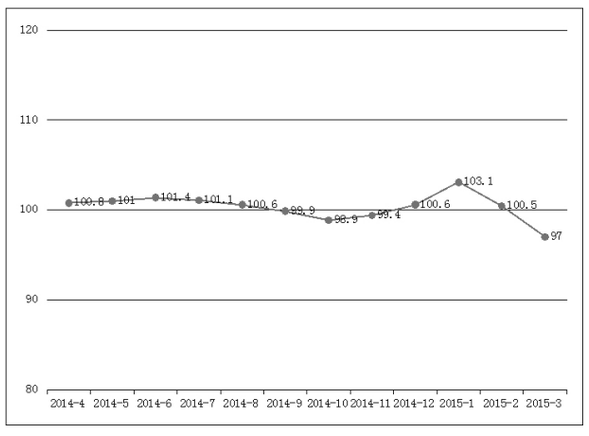


图1：2014年4月-2015年3月全国-全行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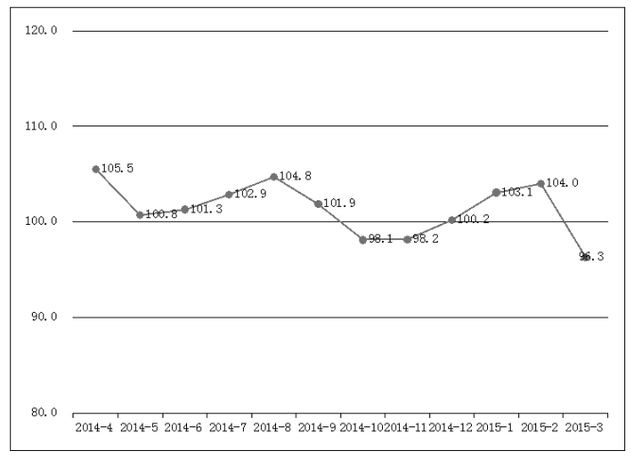


图2：2014年4月-2015年3月全国工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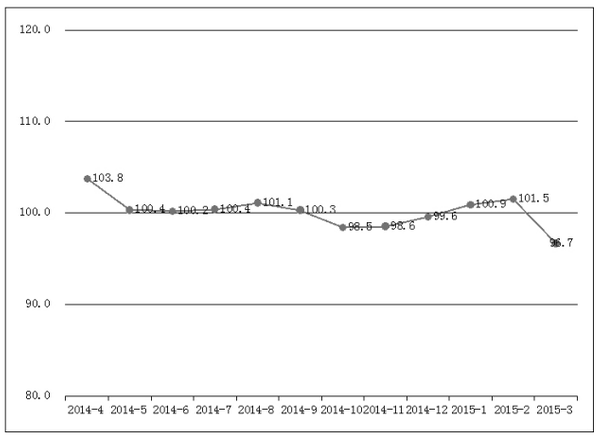


图3：2014年4月-2015年3月全国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指数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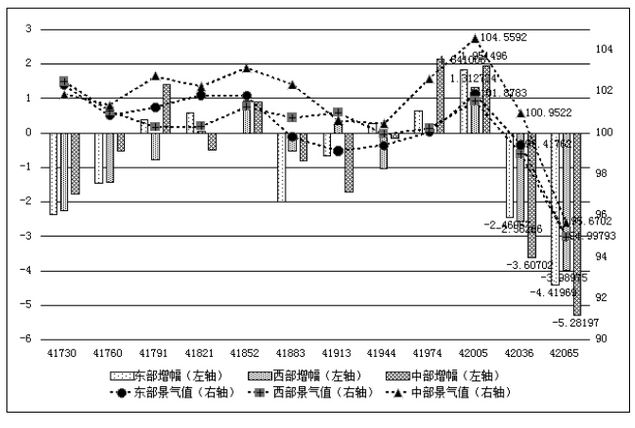


图4：2014年4月-2015年3月东中西部地区景气指数柱形图

经济时评

经济下行不可怕

□杨英杰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增速创6年来新低；3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49.6，创四个月新低；学习时报—百度中小企业景气指数（STBEI）一季度数据全面下行。“三期叠加”效应是中国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内因，当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给长期以来出口贡献率居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

经济下行虽然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种种不利因素，但更多的积极效果是隐藏于水面之下阻碍经济前行的种种弊端在经济困难的当下也得以充分暴露，问题倒逼改革正当其时。中国经济存在问题之直接根源，在于科技创新不足，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甚至庞大的逐步走向高端的国内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也最终归结为技术创新的薄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不转型已难以为继。形势逼人，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引领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我们以为，之所以科技创新不足，是制度创新匮乏所致。显然，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多领域多层次改革措施持续发力，正是基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发展痼疾之源的深刻认知。可喜的是，当前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已处于关键时期，改革红利成效初显，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新兴力量正在积聚。

立足当前问题，同时夯实未来发展基础，需从两方面着手，也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双引擎。一是通过政府自我革命加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持续向纵深推进，通过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破除制约市场活力和发展的各种束缚，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并不断提升其质量。当然，财税、金融、价格、投融资等一系列改革也要同步推进，以形成叠加效应，释放改革红利。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仍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巨大潜力就在于改革创新红利持续不断的释放。正如李克强总理近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所强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要用足改革创新动力源，坚持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助力破障过坎，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我国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则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东部向中西部的自发梯度转移和服务业的地域性渐次升级。特别是要把西部大开发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场景中考虑，作为我们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经营好、发展好、维护好。要以中西部地区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为东部地区服务业的升级乃至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换取宝贵的时间。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更多地向西部倾斜，加快构建完整的铁路、公路骨架网络，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要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支持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支持水、光、风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经济下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战略定力，穿新鞋走老路。面对困难和问题，我们要科学把脉形势，既分析客观因素，又要找主观原因，既对长期向好充满信心，也要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决不能在问题和困难面前乱了步调没了章法，要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和路线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动，不希冀毕其功于一役，真正做到久久为功，水到渠成。

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上接第1版）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新增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将随之减少。反过来看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投资回报率上升，则投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来衡量一国的投资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代表实现一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越多，投资回报率则越低。2008年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量资本产出率却有所下降，2013年为5.68，而同期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说明我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大国比，投资仍是一项有价值的行为。

再看消费潜力。未来10年，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消费总额4.7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3496美元，而同期美国消费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3329美元，我国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8%。假设美国消费按照2%的速度增长，10年后美国的人均消费将达到52818美元，假设10年后我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30%，就是15845美元，将会是目前消费水平的4.58倍，年均可增长16%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有三个支撑点可将其变为现实：第一个是城镇化提速。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15471元，随着未来10年1.3亿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2万亿新增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中还包括没有户籍的2.7亿常住人口，随着常住人口转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消费也将扩大。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多次消费升级，每一次升级都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当前正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逐渐从产品消费转到服务消费、从物质消费转到文化消费，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保持强势增长。以电商为例，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637.2亿元，增速为45%，远超传统商业。信息消费也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第三个是巨额储蓄。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储蓄率为51.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3%。储蓄是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储蓄多意味着消费少。如果我国储蓄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可增加消费13.5万亿。

最后看出口潜力。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出口本身并不直接贡献GDP。短期内虽然加大出口可以缓解国内过剩压力，但若只出口不进口或少进口，换回来的仅仅是外汇，外汇是人家进口我们商品后开具的借条，不用来进口就是一堆纸。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是要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出口是为了进口，只有进出口平衡才是双赢。对我们这样的非储备国来讲，外汇过多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国际分工收益的分享。今后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积累外汇的需要将进一步降低，因此我国未来开展对外贸易目标应是贸易平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比美国还多2500亿美元，出口占到全球11.7%，进口占全球10.3%，比例已经不低，那种希望长期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必要。当然，出口不追求高增长但也不是不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今后出口每年保持6%的增长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服务贸易，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的4.6%，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去年逆差是1980亿美元），如果能补齐服务贸易这块短板，未来整个出口还会有可观的增长。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和消费都能拉动经济，但作用是不同的。据测算，中国前3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而消费的贡献率仅10%。今天我们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以往过于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今后我们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转向扩大消费。

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十七大前中央讲扩大内需时提“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提“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与投资的排序之所以要变，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生产，这样的生产除了增加GDP与产能过剩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比如投资与民生有关的交通运输、城镇化、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等，就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也能带动增长。

扩大消费的办法很多。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维护消费安全，如此等等都能拉动消费。不过，归根到底是收入决定消费。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十八大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实现翻番，这对于稳定收入预期、拉动消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2014年我国启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更加公平的社保体系，居民就可以从防范未来风险中腾出部分储蓄用于消费，我国未来消费保持11%的增长就不足为虑。

第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扩大内需虽然要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但同时也要扩大投资。问题是扩大投资钱从何来？有三个选择：一是加税；二是发债；三是减税。加税与发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扩大企业投资。显然，讨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实质就是要在加税、发债与减税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就扩大政府投资而言，是加税还是发债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则主要是发债。实践证明，加税效果明显不如发债。对此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不错，经济下行时加税确实是杀鸡取卵，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与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却有助。

但从长远看，发债过多日后会挤出企业投资。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因为政府发债自己还不了，最终得靠企业缴税来还。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这就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